

印尼與中共復交來由之探索

羅石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印尼總統蘇卡諾，在印共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發動政變，企圖先將堅決反共的印尼軍方將領，於一夜之間殺戮殆盡，但對當時膺任戰略後備司令的蘇哈托將軍，由於深夜往捕，誤將其副官認為主人予以殺害，乃使他成為漏網之魚而得以指揮軍隊弭平「九卅」政變，從而掀起印尼軍民狂熱的反共運動。雅加達因此宣佈和中共斷交，除驅逐中共使館人員外，且使華僑亦受池魚之殃。①中共一再向印尼尋求恢復邦交，但一般却認為在軍方尚掌握雅加達政權——尤其蘇哈托仍擔任總統期間，雅加達和北平將難以重拾舊歡，誰知蘇哈托竟然親自向中共「外長」表明印尼願與中共外交解凍，何以致此？確實值得深入探索其中來由。

一、戰略地位與龐大複雜的居民

印尼是由羣島組成的國家——由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座島嶼所構成。除無人居住的島嶼外，有人定居者，有一千座島嶼，其中以爪哇島、蘇門答臘島、蘇拉威西島、婆羅洲加里曼丹、西伊里安島等五座島嶼居民最多，面積最大。其總面積佔全印尼總面積一百九十九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印尼海岸線總長為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六公里，羣島散布：南北寬二千二百一十公里，東西長五千二百七十一公里。

印尼總人口——據一九八八年統計，為一億七千六百六十萬，出生率為百分之二點一，而爪哇島上又為居民集中地區——約有居民一億人，為緩和爪哇島的人口壓力，雅加達政府正推行人口徙置計畫，鼓勵人民遷徙到人煙稀少島嶼定居。②羣島之國的印尼，位居赤道南北，分佈在三千哩長的弧形地區，鎖鑰印、太兩洋，為東南亞通往澳、非、歐三洲的門戶

註① 阿諾德·布瑞克曼著，張文德譯，「印尼九卅政變真相」(Indonesia: The Gestapu Affair)，共黨問題研究月刊，第七卷第八～九期。
註② 陳鴻瑜，印尼外交政策：持續與變遷，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九卷第八期，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日，第五五～七七頁。

，加以蘊藏的戰略物資極為豐富，一向為列強所必爭之地，因此，在二次大戰之後，印尼解脫了三百多年的殖民枷鎖，為了保衛國家永久獨立、自由，其對外對內政策，無不著重於「平衡」，基於在全印尼人口之中，其族系非常複雜。主要族系是馬來族——因語言和文化的差別，又分成許多的族羣團體——其中以爪哇族最大，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其次為巽他族，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五，其三為馬都利族，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其他較大族羣有：巴塔族、布金族、伊利安族、峴那卡波族、巴布伊族、登吉利族，此外住在偏僻地區的少數民族有：班特族、阿斯族、達雅克族、馬卡沙利族、杜拉加族、峴納多族、圭朗族、班古拉吉族、穆納布丁族、安邦族、羅蒂族、里羅族、亞東族、巴里族等，外來的少數民族有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

二、印尼為何採中立不結盟外策

五十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對印尼標榜中立及不結盟外策頗表不滿時，曾經擔任過印尼副總統先後十二年之久的哈達（Mohammad Hatta）博士，在美國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對此項外策有所闡釋，其中指出：

「在自由運動中，印尼領袖，要求人民努力以獲得獨立、主權、團結、公正及繁榮的國家。目前開國的奮鬥，在建立自由主權的印尼方面已然成功，因之政府主要使命即為使國家團結、公正而繁榮。為完成上項使命，印尼需要其他國家的友誼與和平，乃屬極易了解之事。印尼雖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立國伊始，百廢待興，必須仰賴來自國外的物資與知識之援助，這是一個迫切的原因，使它採取要作大家的朋友，而不作任何人之敵人的政策。它的理念以及全體人民的宗教敏感，使它既能與西方國家合作，而又不憚於與共產國家論交，它深切了解共存和不干涉內政政策的真諦，因之，儘管若干國家的思想與印尼不同，只要彼此不干涉對方的內政，一定可以和印尼並肩和平共存。」^③

中立外交，只是印尼傳統的內政外交平衡國策的一環，其實也是它「平衡」國策的對外部份。在世界上自由和共產兩集團對立之情勢下，雅加達乃以自由集團國家來制衡共產國家集團，此不僅可以使它左右逢源，且在共產國家之中，以蘇中兩共互相牽制而得以平衡，此外又結合亞非新興國家在印尼「萬隆」舉行會議而組成「亞非集團」，繼後乃衍變為「不結盟」國家團體，加入者與年俱增，使印尼在國際上佔有相當地位。這些都是出於印尼對外的平衡政策而來。

註③ 「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五八年四月號。

三、印尼對內的平衡政策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雅加達的中立外交既然是爲了追求在國際關係上的平衡，其在內政方面的平衡方略，更值得大家的注視，由於此一羣島國家，從爭取脫離殖民地而求得獨立之初，各種勢力無不乘時乘勢崛起，因而在黨派方面多如牛毛，且立場歧異，其中有「印尼共產黨」——其組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共和其他亞洲國家共產黨誕生均踴躍乎其後，連蘇聯共黨亦在其後誕生，由於印尼共黨在該國爭取獨立期間，曾經發動過以武力奪權，被印尼軍方予以平定，遂形成軍方與共黨大有勢不兩立的立場。

有平衡能手之稱的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其所以在倚賴軍方大力支持的情勢下，又讓印尼共產黨成爲合法政黨，並不止於以此在外交上籠絡共產集團國家建交，而著重在對內以共黨向軍方制衡，他如有極端反共的政黨——「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黨」、「伊斯蘭聯盟黨」、「穆斯林黨」、「貝爾蒂斯伊斯蘭黨」，但也有左傾的如「國民黨」（民族黨）、「貧民黨」、「獨立維護者聯盟」，此外尚有自由主義的政黨——「天主教黨」、「基督教黨」，讓這些左右和中立等立場歧異的政黨和團體並存，在雅加達制衡國策觀點上，便是爲了讓它們相互制衡。^④

若問印尼共黨何以在蘇卡諾執政期間，能夠勢力膨脹，以致擁有武力可以發動「九卅」政變？基於印尼共黨針對蘇卡諾的野心妄想，宣稱他是印尼獨立之父，號召擁護他爲終身總統，毋須再經由大選。因而促使他祖護印共發展，除擁有三百萬黨員外，在農民、學生、勞工及文化等組織中，又有同路人一千兩百萬之衆。因爲所有左傾政黨，大都被印共地下黨員所滲透利用，以致蘇卡諾橫被它利用而不自知。

印尼共黨在蘇聯和中共爲「和」「戰」路線而互相攻擊時，它已倒向中共，因此中共又利用它蠱惑野心勃勃的蘇卡諾，走上企圖和中共平分東南亞地區互建勢力的道路，以中南半島陸域國家爲北平勢力範圍；以非、新、婆羅洲等海域國家以雅加達爲中心。^⑤當位於婆羅洲的沙巴、砂朥越在英國影響下準備與馬來亞共同組成「馬來西亞」（大馬）時，由中共支援印尼建立傘兵部隊——訓練裝備印共人員，用以破壞此項計畫，便是由此而來，而印尼軍方亦有左派崛起，因而使印尼共黨挾此而企圖政變奪權。^⑥

註④ 蘇玉珍，「印尼並選大勢」，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年二月廿三日，刊載（中央社）駐印尼特派員特稿，第五版。

註⑤ 黎世芬，「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四卷，第六期，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十日，十七頁。

註⑥ 同註②。

由這些事實，說明了「九卅」政變，乃由於執行對內外平衡國策的蘇卡諾總統，在左右重心方面偏向於左，且在左傾外策上，又偏向北平而使然。蘇哈托從印共屠刀下得以逃生，於掌握到印尼政柄後，痛定思痛，對傳統的平衡國策如何矯正？自屬他首要的任務目標。

四、蘇哈托所顯示的新政策端倪

一九六六年蘇哈托政府，由於國內的經濟，已經到達了破產邊緣，不能不接受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的經技支援，方可起死回生，於是組成了所謂「開發內閣」(Development Cabinet)，以重建經濟為最高原則，其十八位部長之中，以留美回國的經濟專家佔六位。^⑦在對外關係上採取中立偏右，在與中共斷交時，其所以仍然和蘇聯維持外交，並不止於因莫斯科並未牽涉到支持印共的「九卅」政變，主要的，還是為了保持非右轉外交，至於對北平的關係只宣稱為外交關係「凍結」，表明隨時可以解凍復交，正是為了警示蘇聯。

再由雅加達於蘇哈托上臺後，即與馬來西亞修好，並竭力促成和馬、新、菲、泰共同組成「東南亞國家協會」，此即說明印尼已放棄它和中共平分東南亞的企圖。一九六八年三月，蘇哈托向「人民協商會」明白表示，「東協」之組成，是出於印尼的主動，可見印尼對促成此一區域組織的努力，且係低姿態，斷沒有以主宰者自居。印尼對「東協」的企劃目標，乃著重於伙伴國的經技文化交流，而非軍事聯盟，它企求此一區域組織促使東南亞成為「非核區」而保持中立，但亦表明無意迫使美國勢力退出東南亞。從印尼外長莫達，於一九八六年出席馬尼拉舉行的「東協」外長會議時，表明：「東協」不會採取像紐西蘭一樣的立場——拒絕美國艦隊使用本國港口，及迫使美國退出此一地區。^⑧

從這些情形，即可窺知蘇哈托執政後的印尼，對「東協」的組成，雖竭盡了其力量，但斷沒有主宰此一區域組織的野心，更不會含有驅除美國勢力以換取東南亞成為「非核區」，以實現中立化的用意。這是雅加達重新調整其對外政策的一端。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共多方呼籲和它復交，雖都不作回應，連工商界企圖突破與中共經貿直接往來關係，亦在所不許，但當越南挾蘇援出兵侵柬併寮，導致中共揮軍攻越北，且向「東協」國家推行「反霸」統戰，使「東協」國家都樂於與北平聯手反霸，雅加達亦與伙伴國站在同一立場，其後在中共再推行開放政策時，印尼和「東協」伙伴國一樣，亦允許其工商界爭取

註⑦ 郭湘章，「訪問印尼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廿日，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譯印。

註⑧ 同註②。

中國大陸市場。

五、對內部各派勢力的調整

蘇哈托對「九卅」政變的檢討，自不能不認為外患乃起自內憂——印尼共黨自然是禍亂的根源，而其他左派各種勢力的推波助瀾，亦斷不可忽視，當年蘇卡諾過於相信中共所標榜的五原則所謂「互不干涉內政」，從而使印尼共黨坐大，其實哈達當年在美國外交季刊中所發表闡釋印尼外策的文章中，已有明白的指陳，他指出：

「我們深知作到不干涉內政，確有許多困難，由於在共黨國家中，一切事務均由政府監督，言論表達自由，根本不存在，所以民主國家，斷沒有干涉其內政的可能。但在民主國家則又大不相同，例如即使蘇聯和另一國家訂有共存而互不干涉內政的協定，且確實遵守，但那國家的共黨，却非服從來自莫斯科的命令不可……。」

這便說明了印尼共黨的「九卅」政變，固然是聽命於北平，而蘇卡諾甘讓它坐大，及印尼左派勢力，從而甘作它的附庸，實屬造成共黨政變的根源。蘇哈托當政後，除已將印尼共黨份子一律逮捕監禁，及宣佈共黨為非法者外，最重要的，乃著重於整頓林林總總的政黨。

首次整頓政黨，是一九七一年——第二屆大選之前，於頒佈普選法中，剝奪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的選舉和被選舉權，另方面有計畫地派遣退役軍人參加各政黨，使他們結合各黨思想正確者成為主流，以制止走向思想偏狹而被共黨暗中利用，並設法使性質相同的政黨予以合併，到大選提名前，被核定可以參加競選的，只有九個政黨：依其立場，約可分為三個類別：

(一)極端反共的四個同教政黨：(1)「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黨」；(2)「伊斯蘭聯盟黨」；(3)「穆斯林黨」；(4)「貝爾蒂斯伊斯蘭黨」。

(二)左傾的蘇卡諾主義三黨：(1)「國民黨」(民族黨)；(2)「貧民黨」；(3)「獨立維護者聯盟」。

(三)親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兩黨：(1)「天主教黨」；(2)「基督教黨」。

此外又有異軍突起的政黨——「從業人員集團」——簡稱「職聯」或「高爾半」(Sekber Golkar)，乃由九個職工團體——包括各種工會、公教團體、公務員協會等聯合組成，在選場，用以代替執政黨，因而造成蘇哈托政府提名者都能當選。

第二次再整頓政黨，又將九個政黨合併為兩個政黨：即「回教統一建設黨」(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簡稱(PPP)，與由「國民黨」、「天主教黨」、「基督教黨」聯合組成的「民主黨」(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簡稱PDI，加上「高爾卡」，一共只有三個政黨，已再不是政黨多如牛毛。⑩

六、安內和攘外並重

蘇哈托執政後竭力從事經建，大量爭取外資科技投注，已使工商業者日漸富裕，但別有用心者則抨擊此項經建，適足以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號召人民起而反對，這是左派的呼聲，但極端反共的回教信徒之中，又力主使印尼成為回教國家——且有「聖戰組織」出現，此外是印尼共黨殘餘領袖們托庇於北平，在中共支持下，已將赤氛延伸到了印尼內部，企圖死灰復燃。⑪

另一支親蘇印尼共黨，在星德里設立總部，且由蘇聯駐印尼使館扶助，將實力伸入印尼，使堅決反共的回教徒為此非常擔憂，印尼軍方的戰聞報於一九七七年元月七日，刊登了一批在印尼活動的蘇特務人員名單，揭露他們偽裝大使館官員、貿易商和輪船公司職員，或「塔斯社」記者，進行扶助印尼共黨叛亂顛覆活動，報導中又引述投奔自由的蘇聯異議份子阿瑪里克的話說：在印尼約共有二百名蘇聯人，不包括眷屬，事實上是「格別烏」(KGB)、和「格魯烏」(GRU)軍情部間諜，該報並指出「塔斯社」駐雅加達首席記者為「格別烏」官員，曾於一九七〇年間間諜活動被逐出美國，其所公佈的在印尼蘇謀名單中，包括蘇使館一、二、三等秘書，雅加達新聞處職員、及船運公司和貿易部官員。⑫再由當時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揭露沙維托反政府事件，乃蘇聯「格別烏」人員製造動亂的陰謀，可見當時印尼軍方和回民一樣，不滿政府靠近蘇聯。

蘇哈托執政後的印尼，在清除印尼共黨及與中共凍結外交，但對蘇聯的外交關係則仍然保留，此並非止於為了使右傾的外交由此而得以平衡，其實乃由於蘇卡諾政府欠了蘇聯的債款十億美元，且印尼三軍的武器裝備，幾乎都是蘇聯的製品，無論修護和零件彈藥供應，都須仰賴莫斯科。蘇哈托政府以馬力克擔任外長，乃基於他是蘇卡諾政府製訂中立外交政策者之一，且曾經擔任過印尼駐蘇大使多年，讓他參加新內閣，不僅可以使國內蘇卡諾殘餘勢力得以安撫，且可讓他代表新政府和莫斯科週旋。此中艱苦，由他經常從蘇聯回國路經香港，宣稱雅加達即將與北平復交，即可窺知他乃以此警示蘇聯。同時也含

註⑩ 羅石圖，「印尼大選與政局」，及「印尼大選與今後外策的評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六卷，第四期，及同卷第十期，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十日。

註⑪ 卡諾 (Stanley Karnow)，「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原載一九七〇年一月廿六—七兩日華盛頓郵報，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五日譯印。

註⑫ 大公報 (香港)，一九七七年元月八日，第三版。

有安慰蘇卡諾殘餘力主以與北平復交來抑制蘇聯之意。

至印尼揭露了蘇聯間諜在印尼活動頻繁，從而引起了印尼官民一致忿慨之際，馬力克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在國會表明：印尼爲應付萬一，重整軍備與經濟建設具有同等重要性。而更換六十年代的蘇製武器裝備，使之現代化而增強戰力，又爲重整印尼三軍裝備的重要課題。至於新的武器裝備由何而來？他在印尼駐外使節會議席上，更露骨地表明：印尼將避免向共產國家尋求軍備，只要能從自由國家獲得武器，絕不向共產國家尋求。⑭這便不難推知馬力克爲了印尼三軍裝備武器向蘇聯尋求零件補充及修護等，其所遭受的苦頭。

此一時期，印尼一方面在內部掃除反對勢力——包括整肅陸軍中與共黨有牽連份子，蘇哈托在一次演說中指出：「假如我們軍隊裏有人和共產黨牽連，我們不應引以爲恥，因爲他們是舊秩序的殘餘……。」那次聲明，便是將被控與蘇卡諾有勾結，因而間接與共黨有關係的十餘位將領被撤職或下獄的前奏。⑮這更可顯示蘇哈托政府安內和攘外並重。

七、慶祝萬隆會議廿五週年的多種意義

一九八〇年四月，印尼擴大紀念「萬隆會議」廿五週年，及建立蘇卡諾墓碑，一般只注意到雅加達的著眼點，在於表明「不結盟」集團，乃由萬隆召開的「亞非新興國家會議」嬗衍而來，俾便提高印尼在該集團的地位，斷不亞於印度，其實印尼當政者的用心何止如此？至少具有警示蘇聯，安撫國內沉迷於聯中共以制蘇聯的蘇卡諾殘餘勢力，更是和中共外交解凍的先聲。回溯萬隆會議召開時，由蘇卡諾及尼赫魯等摒蘇聯代表於會議門外，使中共代表團成爲此一會議中幾已衆望所歸，即可想見此中的意義。

一九五五年四月，由蘇卡諾、尼赫魯及字努等發起的亞非新興國家領袖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蘇聯和中共都熱烈響應，但對來自莫斯科的代表，發起人只將之尊爲貴賓，認爲蘇聯並非亞非國家，名爲貴賓，實則將之摒於會議大門之外，使以周恩來爲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在會議過程中，一直被出席會議者，有如衆星拱月，中共標榜的包括不干涉內政等的五原則，即是由此而開其端，也揭開了印尼人沉醉於聯中共以制蘇聯幻想的大門。至於蘇哈托掌權的雅加達政府，何以擴大紀念萬隆會議，並同時建立蘇卡諾的墓碑？此不僅在安撫國內蘇卡諾的殘餘份子，其實也具有開啓了與中共復交之門的先聲。由中共「

註⑭ 聯合報（臺北），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第四版。
註⑮ 同註⑭。

外長」吳學謙亦受邀參加，即可窺知端倪，向蘇聯示警，亦在不言之中。

若問當時中共何以沒有把握此一機會加緊和印尼談論復交問題？雅加達又何以未向中共作復交的表示？由蘇哈托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向印尼「人民協商會議」致詞時表示：「只要北平繼續支持東南亞共產黨，印尼就不會與中共恢復正常關係」……又說：「由於我們把安全與國家利益，置於其他一切利益之上，只要中共無法使我們相信它不會支持東南亞各地共產黨殘餘份子，我就會認為目前尚不是與中共恢復正常關係的時候」。^⑭至留在北平的印尼共黨殘餘份子，已全部轉移到了東歐，且獲蘇聯暗中庇護，雅加達對北平便已改觀。

其實這批留在北平二十多年的印共殘餘領袖，年事已高，在鬪志方面已力不從心，何況當年印共在國內的同路人勢力已被蘇哈托政府所清除，無法對它捲土重來有所響應，中共爲了爭取印尼和它復交而讓他們遠離中國大陸。正是合乎雅加達和它外交關係解凍的主要要求，與華國鋒召見他們以威脅印尼相比，在鄧小平當權後的北平政權，顯然高明得多。此外對中共 and 印尼復交有催化作用的，尚有幾件大事值得省思。

八、印尼華人問題對雅加達與北平關係之影響

印尼華人總數約有四百一十一萬六千人（一九八一年統計資料），在印尼總人口之中，約佔百分之二點八，在比重方面雖很輕，但却掌握了當地百分之六十、八十的經濟活動，因此，印尼政府在獨立後不久，即開始採取限制華人權利的政策——一九五五年與中共達成協議：禁止印尼華人取得雙重國籍。繼後又由總統頒布第十號法令——禁止當地華人在鄉村地區經營零售業，中共駐印尼「大使」向雅加達政府提出抗議，且在背後唆使當地華人鼓噪示威，結果印尼政府在審視該法令對印尼經濟的可能影響後，由商業部長訓令——只有在不影響政治穩定情況下才可實行，但各省並未施行該項法令。

一九六五年「九卅」政變後，雅加達政府關閉所有華校，一九六八年一月，允許華人開辦「民族特種學校」，繼後又改爲「國民學校」。一九五八年，禁止華文報刊出版，一九六五年，只允許官方主辦的印度尼西亞日報，有極少篇幅的華文報導，且有法令禁止華文書刊在市面出現。此外，印尼政府亦基於對華人少數民族的偏見根深柢固，不願對華人入籍採取較寬大的措施，這些都可以看出印尼於「九卅」政變弭平後所掀起的排華怒潮餘波，迄未能遏止。至一九八〇年，印尼政府對華人入籍規定大大放寬後，使絕大多數華人都已取得印尼國籍，此即蘇哈托於上年二月在東京會見中共「外長」錢其琛表明：

註⑭ 同註②。

印尼願和中共外交解凍來由之一。^⑮

由於印尼當年認為印尼華人，乃為中共的「第五縱隊」，隨時都可聽命於北平在印尼興風作浪，到華人都已取得印尼國籍後，雅加達政府便可視為子民而繩之於法，中共在印尼的使領館便無權干涉。

九、另有兩股融化凍結關係的暖流

近年來，印尼對外極力爭取市場——推銷石油以外的其他產品，對中共開放沿海港口，號召外國商人投注經技，共同開發擁有龐大人口的市場，使「東協」國家的工商界無不熱衷於此——尤其是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印尼工商界亦不肯落後，使雅加達面臨此項壓力，不得不打破禁止和中國大陸直接貿易的成規，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和北平簽訂「直接貿易備忘錄」，恢復了中斷了廿多年的雙方直接貿易關係，使先前從新加坡和香港轉口的交易因而可以直接交易，貿易總額一直在增長之中。

一九八六年，印尼與中共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四億七千六百萬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三，印尼向中共出口的商品，以各種木板為大宗，其次是肥料和原油。一九八六年的出口額為一億四千萬美元，比上年猛增百分之六十五，印尼從中共進口的主要商品有：飼料、食油、棉布、紡織品、化工產品、工具、醫療器械、家庭日用品等，進口額達三億三千萬美元，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卅五。

據不完整的統計數字，一九八七年，印尼同中共的雙邊貿易額，為七億八千四百萬美元，而一九八八年，雙方貿易額，已超過十二億美元。一九八八年頭九個月雙方直接貿易中，印尼的出口總值達五億三千多萬美元；進口總額為一億六千餘萬美元，經香港轉口貿易中，出口總額為二億多美元；進口總額為二億七千五百多萬美元，數值顯示，在一九八八年，雙方貿易中，印尼出超最少也達三億美元。印尼輸往中共的商品仍以木材為主——特別是三合板，中共輸往印尼的商品，則以食用油料作物、棉花、紡織纖維和飼料為大宗。^⑯

「東南亞國家協會」的組成，乃印尼在蘇卡諾當權後所極力促成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他對國會致詞，首度表明他對區域主義的看法，他說：「當對抗馬來西亞此一問題解決時，我們就能進一步把外交政策活動向前推進——建立東南亞國家間在互利基礎上密切合作；特別是在經濟、技術和文化領域」。又說：「假如有一天一個整合的東南亞能夠建立起來，這

註⑮ 同註②。

註⑯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一版。

個世界的一部份就能堅強地站起來，以及面對來自各方——無論是經濟的、軍事的干涉等外來影響，一個合作的……將構成最強大的堡壘和基地，可面對無論何種形式來自何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挑戰，由此可見印尼主動促成「東協」區域組織的用心之深。^①

不過以廣土衆民的印尼，和其他「東協」伙伴國相比，無論土地人口，都超出其他國家的總和，但從來沒有過顯示領導者的氣魄，始終都是極力爲此一區域組織服務，尤其對柬埔寨問題方面，從來人抗越三邊會議在新加坡召開，其間印尼代表，無論在幕前幕後，都發揮了頗多的促成力量。至侵柬越軍全部撤離，「東協」爲促成柬埔寨四方面以談判達成和平，印尼又主動邀集柬埔寨四派和「東協」國家及越南代表，在雅加達兩度集會，但都沒有結果，使印尼非常遺憾但始終沒有因此灰心而放棄調停。

從印尼外長阿拉塔斯於訪問北平之前，在東京宣稱：「中共對柬埔寨和平問題，具有舉足輕重作用。」^②由此不難窺知印尼爲促成柬埔寨四派棄戰從和問題，只好求之於復交後的北平，這又是雅加達和北平外交關係凍結使之溶解的另一股暖流。

十、結 論

印尼總統蘇哈托於上年二月決定與中共進行復交後，又於同年九月訪問莫斯科，與戈巴契夫共同發表聲明，表明兩國友好，^③從印尼的平衡外策而言：此不僅是它爲「九卅」政變弭平後爲挽救經濟危機而偏向西方，從而轉向左傾以實行外交中立，且在蘇中兩共之間，形成左派的互相制衡，殊不知時移勢轉，曾幾何時，被稱爲蘇聯東歐附庸國，紛紛興起民主浪潮，在赤色政權面臨危機時，莫斯科愛莫能助，且其本身亦在民主浪潮沖激下，不得不顯示將趨向民主自由以挽救經濟危機，對被稱爲赤化東南亞前進基地的越南，既已逐步撤出「金蘭灣」基地的海空軍基地，對河內的軍經援助，亦斷然停止。

對中共籠絡「東協」國家和它聯手「反霸」的立場而言，大霸既已停止向東南亞伸展霸權，剩下的小霸越南，又安有稱霸的條件，可見雅加達的與中共復交乃出於引狼拒虎的企圖。在面對老虎已經無力逞威情勢情況下和中共復交，豈非引狼入

註① 同註②。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六月卅日，第一版。

註③ 「蘇聯印尼兩國領袖發表友好原則聲明」，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三版。

室而不惜自啓禍災？不知雅加達對此將如何維護本身及其伙伴的安全？

再從印尼正與中共談判復交時，又派遣其能源部長金那得買率團訪問臺北，並邀我國經濟部長陳履安訪問印尼，企圖將以政經分離而與臺北保持和增進經貿等關係，^②這又顯然在以與臺北加強關係而制衡北平，不過印尼對臺北所需求的，不僅是經技的投注，最重要的是經建發展的經驗——尤其是農耕方面的發展步驟及技術支援，例如我國農耕隊在印尼所建立的示範農村，從事綜合農業經營，提供技術援助，由於成果卓著，贏得了印尼朝野口碑載道，以致期滿後一再延長。^③此外印尼的道路開發工程，多有賴於我國工程隊，不知印尼與中共復交後，如何再可在這些方面得到我方協力如初！

註② 「印尼能源部長訪華」，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卅一日，第三版。

註③ 羅石園，「印尼對華外策的剖析」，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一卷第五期，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十日。

*

*

*